

《傳播研究與實踐》論文投稿資料

請用*號標示何者為通訊作者	第一作者			
投稿人中文姓名	傅文成*			
投稿人英文姓名	Wen-Cheng, Fu			
主要現職中文名稱	副教授			
主要現職英文名稱	Associate Professor			
(通訊) 作者 Email	uiucfuwencheng@gmail.com			
(通訊) 作者聯絡電話	0937840874			
(通訊) 作者連絡地址	台北市北投區中央北路二段 70 號 國防大學 新聞系			

年金改革議題的風險傳播：從公眾情境檢視認知、傳播行為與政策支持傾向

摘要

本研究以公眾情境理論為主軸，探討目前我國面臨金改革此重要社會風險議題時，媒體新聞影響不同情境涉入程度社會大眾的風險感知、風險阻力感知與議題傳播行為的脈絡，同時也將對政策的支持傾向納入檢驗目標以延伸公眾情境理論在社會風險議題的解釋範疇。本研究於立院審議公教人員年金法案期間，進行全國性抽樣，獲得 1,197 個受訪樣本。研究成果發現，民眾的新聞注意程度與議題其情境涉入程度均影響國民對年改風險議題的風險感知、風險阻力感知、議題傳播行為與政策支持傾向。

關鍵詞：傳播行為、新聞注意、政策支持、風險感知、公眾情境理論

Risk communication on annuity reform issue: Using situational theory on public to examine public's risk perceptions,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and propensity of policies support

Abstract

This project used situational theory of publics to examine people's risk perceptions, constraint recognition,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and propensity of policies support on the annuity reform issue that were influenced by media. The researcher conducted a nationwide telephone survey which collected 1,197 samples while the Legislative Yuan processed annuity reform issu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news attention levels and situational involvement of public would influence their risk perceptions, constraint recognition,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and propensity of policies support. Implications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communication behavior, news attention, policy support, risk perception, situational theory of publics

壹、研究動機

台灣主要的年金制度，包含軍公教退撫基金、勞保基金、公保準備金以及國民年金（又稱為四大基金），以目前的支用情形估算，將於 2019 年起陸續破產，整體受到波及的國民將超過 940 萬人（陳炳宏、黃以敬，2015）。根據世新大學民調中心與今週刊（2015）合作的民意調查發現，高達 82% 的受訪者認為這個議題是台灣當前重大的挑戰；72.2% 的人認為這是未來新政府的施政重點。值得一提的是，有 65% 的台灣民眾對此一議題感到悲觀，認為台灣將來會步向希臘於 2015 年的金融危機一般，使整體退休制度崩潰，進而衝擊社會安定（鄭國強，2015）。

從上述我國年金制度可能產生的影響、衝擊層面及未來發展展望觀之，年金改革（年改）議題符合 Brun（1992）界定風險的特徵，他認為所謂的風險應該是指具有傷害或是失去可能性的事件。針對風險的認定可以分為兩種取徑，其一是認為風險是一種實體可供測量的事件，且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研究可以用風險的發生機率以及發生後的衝擊程度等變項，作為策繪風險樣貌的工具（Aldoory & Van Dyke, 2006）；而另一取徑則是，民眾所認為的風險，是由社會建構，並受文化、歷史演進與社會脈絡相互對話而得（Aldoory, Kim & Tindall, 2010）。換而言之，風險的大小與影響的範圍探討，需要回歸到社會脈絡中認定。無論是上述何種觀點，台灣年改議題對於全體國民而言，都可認定屬於重大社會風險的範疇。

而媒體為社會大眾接觸、感知重大社會議題風險程度的主要工具之一（Beck, 1992）。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外在世界的了解，尤其是像是年改議題此類無法直接觸及的議題，需要透過媒體的中介，以接收或傳達對與風險議題的意見。我國對風險感知與溝通的相關研究所關注範圍，以往都是偏向分析全球暖化（林煒國，2010）、SARS（張謙韋，2007）、H1N1 流感（易佳玲，2011）、腸病毒傳染（姜采蘋，2008）等，自然環境或是健康傳播方面的風險態樣與議題，較少研究者聚焦於重大社會或是公眾議題的風險感知、民眾的因應方式等風險溝通的重要因素。

同時，透過 O'Cass（2002）的研究發現，身處在風險情境下的社會大眾可能因為風險影響的不同位置，將對於議題產生不一的投入狀態，這些投入狀態很有可能影響到其後續對於議題解決投入的熱衷程度，更甚者亦影響其對風險處理單位的支持與否。詳言之，涉入程度越高的人會有較高的動機持續不斷更新相關的資訊，並進一步影響尋找資訊所投入的時間、態度、反應等行為，因此高度涉入感的個體對於資訊的搜集之主動性及能力均強，並且容易形成持續性的涉入。此論點與 Griffin 與 Dunwoody（2000）研究相符，均認為民眾對於新聞媒體的關注程度越高，其對問題感知、風險評斷、尋求資訊的傾向也越高。

本研究企圖透過全國性的電話輔助調查，以公眾情境理論為主要驗證架構，探討新聞媒體在年改議題中，公眾風險認知建構扮演的角色，以及公眾面對年改議題時，所展現的新聞關注程度、風險感知與涉入程度所影響的傳播行為與政策支持傾向上的差異。

貳、文獻探討

一、年金改革議題發展

年金制度是一個國家的福利政策核心，同時與該國的人力結構、財政資源的分配與經濟榮衰緊密相關（洪紹祺，2014）。自 1980 年代起，西方福利國家、日本與韓國便陸續透過提高退休年齡、減少給付，以及加入自動調整機制等一連串的削減措施來進行年金改革政策，目的皆在考量整體社會人口趨向高齡及少子化的狀況下，藉由年改制度來穩定國家財政問題，並同時兼顧保障公民退休的經濟安全（郭明政，1999）。

在台灣當前的社會情境中，現行推動年改及群眾高度聚焦的原因初始於 2012 年由政院勞委會所公布的「勞保費率與財務評估精算委託研究報告」中，透露出勞保潛藏債務危機與年度虧損率等訊息，並經過媒體報導後，此議題便引起政府當局、政客及民眾間的討論及關注（洪紹祺，2014）。但其實早在 2008 年引進國民年金保險以及勞工保險年金化時，台灣即開始面臨年金支出過高，而危及國家財政的問題，便接續產生年改議題相關的輿論。

我國的「年金」是一種社會保險，同時也是退休金制度。民眾依職業或身分參加相對應制度，退休或達一定年齡後即可領取現金給付，而在工作或投保期間，除了年金保險人外，雇主及政府也同時需按照比例提撥金額，目的是在於保障民眾晚年經濟安全（審計部，2017）。但在高齡化、少子化的影響之下，如仍以現行繳費與給付水準，未來將造成工作人口沉重負擔（林倖妃、林昭儀，2013）。根據審計部 2016 年度報告中提出，截至 2015 年 6 月底止，揭露出政府潛藏的負債，其預估各級政府未來應負擔各類社會保險及退休給付支出高達 17 兆 9,049 億元（中央政府 13 兆 696 億元、地方政府 4 兆 8,353 億元），與兩年前相較（截至 2013 年 7 月底止）預估之潛藏負債 15 兆 5,199 億元，增加 2 兆 3,850 億元，增幅高達 15.37 %（審計部，2017）。審計部也認為，勞保、勞退與公務人員退撫基金，未來幾年進入給付高峰期，財務問題較大，政府應全面檢討年金制度。

基金和國民年金國保基金再不調整，軍人退休保險將在 2019 年率先面臨破產、勞工是 2027 年、公務人員是 2030 年，即使是 2008 年才剛開辦的國民年金制度，也會在 2046 年面臨破產（林上祚，2015）。鑑此，我國在 2016 年完成總統大選後，加速了年金制度改革草案的研擬過程，陸續舉行國是會議後正式公布年改草案，並於 6 月 23 日完成公教人員年改三讀，完成包含公教請領年齡望後推移等 15 項重點，預計下個會期將續處理軍人年金與勞工年金問題（陳柏亨，2017）。

國內亦有多研究者針對年改進行探討，例如郭明政（1997、1999）詳述台灣社會福利制度發展的過程，提出台灣福利立法與政治因素的密切相關性；陳怡仁（2007）、鄭琪玉（2005）模擬軍人退退休撫卹基金，計算出其存續時間；候仁義（2001）、蘇佳玲（2009）則分別以年金制度發展較為完善的德國及芬蘭，提供我

國一些值得效法的作為，洪紹祺（2014）透過差異分析，比較年金制度改革前後的差異。

綜上，多數的社會大眾是依靠媒體的報導與傳播了解年改相關的內細節與立法進度。本研究企圖將影響人數眾多，且政策形成過程中存在包含改革幅度、請領年資遞延等眾多不確定風險因素的台灣重要社會風險議題中，以公眾所身處的情境為出發點，檢驗媒體傳播社會風險時，與公眾涉入程度情境的交會後，對民眾的風險感知、風險阻力感知、議題傳播行為與政策支持立場的關聯性。

二、公眾情境理論與風險議題傳播

Grunig 與 Hunt（1984）探討公眾參與社會議題時，認為不能忽略公眾的個人背景、對於議題的個人感知等因素，因為這些因素會進一步影響其親身參與議題的決定。渠等以此邏輯提出「公眾情境理論」（Situational theory of publics）。具體而言，Grunig 與 Hunt 依據上述的公眾分類構想提出三個檢視公眾行為的因素，以解釋公眾情境行為。其中影響因素的自變項包含「涉入程度」（Involvement levels）、「問題阻力認知」（Constraint recognition）「問題認知程度」（Problem recognition levels）；被預測的行為變項則有資訊傳播行為與政策支持傾向。

詳而言之，「問題認知」（Problem recognition）即當公眾認知到社會議題的存在，並且可以察覺其中的風險或是需要改善的可能性之後，才衍生了定義議題影響範圍、選擇傳播管道、及參與改進行動等行為層面上的可能性；「問題阻力認知」（Constraint recognition）則意指，公眾預期與意識到進行公眾政策支持程與改進時，可能遇到的阻礙程度，也就是說當個人在面對問題時其察覺到自身能力有限，並認定外界阻力的問題難以解決，其問題阻力認知就越高，則越不容易行動。舉例而言，如台灣民眾認為年金制度的改革需要民意代表的支持，然而，遊說利害關係人改變意見又有相當的困難度時，在阻力的認知層面就會呈現相對困難的水準。「涉入程度」（Involvement levels），即是指涉公眾自覺個人對於相關議題的關聯程度。如公眾的涉入感程度越高，則表示自身與特定議題的關聯性越高（Major, 1998）。綜上，公眾情境理論的機制是認為，社會大眾會因為面臨同一社會議題而產生不同程度的涉入後，進而發展出不同解決問題的行為態樣。進一步而言，與社會事件產生程度不一連結或不同位置的社會大眾，會呈現出對於同一問題卻程度不一的風險感知的知覺差異，據此差異用以預測不同程度的政策支持行為傾向（Hamilton, 1992）。

我國在公眾情境理論與危機傳播相關研究方面，有楊意菁、徐美苓（2012）檢視全球暖化危機的公眾認知與政策支持關聯性時發現，議題感知與政府應對暖化的政策支持有正向關聯性；賀權修（1995）則是檢視高雄地區中油煉油廠環境汙染的涉入程度，與補償政策支持關聯性，結果認為，涉入感扮演影響政策支持與否決定性的角色；辜勁智（2011）探索細菌傳散等公共衛生風險傳播，提出傳播行為與風險感知程度間應是相互影響的關係；陳凱莉（2012）針對食安問題，檢驗社會大眾的涉入程度與政策支持間的關係。綜觀我國公眾情境理論與危機傳播研究的特

色，過往多關照於自然或環境風險議題，本研究則是以社會風險議題為檢驗對象，探索公眾情境理論在非自然危機議題中的運作；再者，本研究意企圖同時檢驗包含媒體新聞注意、議題涉入、風險阻力感知、議題傳播行為等變項在影響風險感知與政策支持時，其影響脈絡與關聯性，期望能擴充公眾情境理論與風險危機傳播的理論架構的進一步應用範疇。

進言之，本研究嘗試綜整原有風險傳播的理論架構中，針對新聞注意程度、風險感知、風險阻力感知與政策支持傾向的探討，並結合公眾情境理論主張以探討社會大眾對於風險議題的涉入程度為出發點之特色（Kim & Grunig, 2007），藉以檢驗不同涉入程度所產生的風險感知與後續是否支持政策的預測。同時，本研究企圖將風險傳播研究範圍朝行為傾向擴展。Major (1998) 認為，公眾情境理論主張透過「議題認知」、「問題阻力認知」、「涉入程度」等變項，分析公眾如何建構對特定議題的認知脈絡，並探究其後續傳播行為的機制，從理論驗證的觀點看來，台灣年改議題是一個牽涉廣泛且對於國民影響重大，並需要投入改革的社會風險議題。公眾情境理論將可運用於分析與分類公眾對於改革議題的認知建構、涉入程度與阻力認知，將可有助於政策執行單位了解民眾的議題傳播、風險感知與政策支持等傾向，據以提出風險溝通的因應策略。

進一步分析公共情境理論的相關研究可發現，Hamilton (1992)；Major (1998) 將社會大眾的問題風險感知與涉入感設定為影響政策支持傾向的重要自變項。然而，在探討社會風險議題時，也有研究者認為，當社會大眾感知到風險影響或發生機率上升時，也會認為該風險議題與本身的切身關聯性越強的情形（Mou & Lin, 2014）。換言之，即問題風險認知程度越高，則涉入感也會隨之增加。造成此現象主要原因可能為，當公眾認為特定議題越重要與風險越大時，越有動機深入了解該議題的細節，進而產生涉入程度越高的現象（O'Cass, 2002）。Sheafer 與 Weimann (2005) 也表達了類似的看法，渠等檢視閱聽人線上公民活動參與時，提出對社會弱勢族群照護越關心的閱聽人，認為弱勢族群社工問題與自己切身相關，且越常在線上的新聞網站上主動點選相關資訊。而 Shakeela 與 Becken (2015) 研究閱聽人對於社會福利議題涉入感與其行為之間的關聯性研究時，則認為風險感知影響社會大眾對於社會福利議題的重視程度，而因為多數民眾無法直接接觸到社會福利政策，多數是透由媒體的傳播瞭政策全貌，故認為風險感知相當程度的中介本研究前述整理的新聞媒體注意程度與風險眼議題涉入感的關聯性。

再者，Zhao & Chafee (1995) 的研究也指出，選舉期間選民對候選人政見的重視程度與切身相關與否的涉入程度，確實影響其對於新聞媒體中，相關議題的資訊近用意願。換言之，風險議題與社會大眾越相關或涉入程度越高，新聞媒體的傳播行為動機也隨之增加（Chafee, Zhao & Leshner, 1994）。

而論及公眾情境理論的依變項方面，Kim 與 Grunig (2007) 認為社會大眾在暴露於風險環境中，或感受風險事件的威脅時，在資訊尋求行為上會有主動搜尋問題

相關資訊、與週遭重要他人討論相關議題等行為態樣。其主要目的為形成後續進行政策支持傾向行動與否的參照。再者，渠等亦認為問題認知程度越高與議題涉入感越高的公眾，對於傳播行為的可能性也會隨之增加。Major（1998）則認為，社會大眾的傳播行為，除了象徵公眾對於媒體使用行為上，對於特定議題的資訊搜尋呈現較為主動的現象外，通常也會伴隨著對於該議題有較為強烈的處理傾向，對於相關規避或縮減風險影響的做法與措施，同時存有較高度的支持動機。

Flynn & Goldsmith（1993）對時裝產製與同工剝削的議題與消費者進行調查，發現曾經消費被指涉不當勞資關係相關品牌的高涉入消費者在產品相關訊息的搜尋上比較主動而且積極，也越常跟朋友談論相關話題；而 Lin（2009）則持相同看法，認為會持續不斷更新相關的資訊並樂於與其他討論議題的社會大眾對政策支持傾向也隨之增加。國內研究方面，榮泰生（1999）認為高、低涉入度不同，會進一步影響尋找資訊所投入的時間、尋找資訊的態度、對資訊的反應等行為均有差異，並且發現高度涉入感的消費者對於資訊的搜集之主動性及能力均強，並且容易形成持續性的涉入，同時也表現越支持解決風險議題之相關政策。由此，研究者根據上述文獻蒐研，提出假設 1 至 2，分述如下：

假設 1：風險議題涉入程度會正向預測議題傳播行為。

假設 2：議題傳播行為會正向預測政策支持傾向。

三、媒體與民眾的風險感知

Beck（1992）在社會風險議題的論述中認為，「風險」是指有一定的機會發生，以及發生後對於民眾會造成某種程度衝擊的事件。他進一步論述風險社會的發展時認為，因為工業社會現代化後，隨著全球各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互動頻繁，導致風險發生時常牽絆著全球不同國家一起遭受風險事件的威脅。舉例而言，當希臘債務問題所造成的金融違約事件在歐洲發生時，台灣的銀行與投資人也因為當初全球投資策略的關係，有約 32 億元台幣的損失，連帶著影響台灣金融秩序的穩定（林倖妃、林昭儀，2013）。McComas（2003）指出一般民眾對於風險的認知不僅是來自於其對風險的想法（Thought），更重要的是他們對於風險的感受（Feeling），因為此感受決定了他們對於風險的評估。個人、社群、或是與風險評估有關的機制之間，不斷交換資訊與雙向溝通意見的過程。由於風險的不確性與複雜性，使得許多專家學者同意社會風險的建構過程必須建立在公共參與的討論上（杜文苓、施麗雯、黃廷宜，2007）。換句話說，風險溝通將成為相當重要的建構程序，大眾媒體對於風險的定義成為是一個重要因素（Beck, 1992），而公眾也在這樣一個社會建構過程中產生對風險議題的認知。

過往許多研究聚焦於健康傳播中有關疾病傳散的風險相關研究認為播媒體在散佈風險相關的資訊以及群眾的感知層面上，累積較豐富的研究成果（Griffin &

Dunwoody, 2000；Procopio & Procopio, 2007；Aldoory, Kim, & Tindall, 2010）。本研究則援引上述研究的脈絡，接續探究「年改」這個重要的社會風險議題中，新聞報導對社會大眾的風險感知、風險阻力感知與後續的政策支持行為意向影響如何。

此外，Lichtenberg 與 MacLean（1991）認為，重大政策與社會議題如具有風險性質，會透過媒體等過濾器產生放大作用，有時民眾的風險感知程度甚至超過風險事件本身的影響。進言之，當議題風險放大後，人民和社會團體或政治團體的關係會透過媒體影響人們對風險的互動和回應。Holland, Blood, Imison, Chapman 與 Fogarty（2012）進一步指出，在面對風險與政策相關議題時，媒體扮演兩種角色，一方面形塑觀眾對議題的認知，另一方面更形塑政府對民意的認知。

進一步探討媒體與大眾風險感知的機制後發現，同 Giddens（1990）所言，大眾媒體除了提供民眾生活在當代社會所需要的資訊外，也提供了生存所需的安全感及信任感。換言之，當社會上產生風險事件時，媒體也扮演了社會大眾感知、處理風險的重要角色（Brun, 1992）。綜上，社會在充滿不確定性的風險事件中，理當成為民眾最依賴的資訊來源，同時對傳遞風險相關訊息、影響民眾認知乃至於後續採取的風險行為的意向都影響深遠（Lichtenberg & MacLean, 1991）。再者，McCarthy, Brennan, De Boer 與 Ritson（2008）則指出，社會大眾對於特定媒體的新聞關注程度，除受到風險議題與自己是否切身相關的感受外，新聞關注程度越高的受訪者通常也呈現風險感知程度越強烈的態樣，並且對於包含在新聞報導中的風險程度認知越高則認為風險議題越難以解決。無獨有偶，Breakwell（2000）針對英國健保支出的風險議題調查研究時也發現，對媒體新聞的關注程度越高的英國民眾，對於政府是否能夠將健保制度持續推動下去的看法也越悲觀。

媒體新聞關注程度除了正向影響社會大眾風險感知外，Leppin & Aro（2009）則認為引發民眾對特定風險議題產生媒體關注的原因，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風險議題與本身切身關聯性的密切程度。Boyce（2007）更指出，經過訪談後表示議題與自己關聯性較高的受訪者，多數的消息來源是新聞媒體，並且自認為看完電視新聞後，覺得風險議題的威脅越大。也就是對於議題涉入感越高的民眾，高度關注媒體上的風險議題報導，並且覺知風險威脅與衝擊越大。McComas（2003）的研究認為一般民眾對於風險議題中內容以細節認知相當模糊，常依賴媒體報導來加以判斷風險影響的程度與切身的相關及鄰近性。

然而，上述的研究果多呈現社會大眾對風險議題的涉入程度影響其新聞關注程度，而後進一步影響風險感知。然而，Mortensen（2010）卻認為風險感知程度與議題涉入間應跳脫單一方向的思考，並提出在上述因果論述中被設定為依變項的風險感知也可能成為影響社會大眾對風險議題涉入性覺知的原因。舉例而言，O'Cass（2002）檢驗政治廣告中，與環保議題相關的風險感知與投票傾向時就發現，認為環保議題與地球暖化的風險越急迫的受訪者，相較於不認為威脅有多大的社會大眾，顯著呈現涉入程度越相關的趨勢。

從上述的文獻分析可以歸結，社會風險的形成與民眾之間的風險溝通的過程中，媒體扮演至為關鍵的角色。媒體的再現方式與民眾的關注程度影響民眾如何看待風險的衝擊範圍，乃至於造成後續政策支持傾向與議題傳播行為等進一步的行為效果。因此本研究據此提出假設 3、4 如下：

假設 3a：新聞注意程度會正向預測風險感知程度。

假設 3b：新聞注意程度是風險議題涉入程度與風險感知程度的中介變項

假設 4：風險感知程度會正向預測議題涉入程度

本研究接續探究媒體觸發民眾風險感知後的相關研究方面。Ogata, Denham, 與 Springston (2006) 探討產生風險感知後的行為傾向時，發現社會大眾為了使心中對於風險的疑慮降低，相較於認為風險威脅不大的民眾，風險感知程度較高者會有較高的資訊尋求行為傾向以及較願意與身邊的朋友談論風險的細節。Mortensen (2010) 也肯定這樣的媒體功能，並進一步認為民眾覺得越棘手的社會風險議題，越有動機主動了解議題的詳細內容，並且也樂於跟重要他人分享資訊及自己的看法。

Kim, Lan, 與 Lee (2008) 探索風險感知後的傳播行為變項，發現韓國民眾在選舉期間對於候選人的主要政見感知到風險後，通常會採取兩種主要的策略以緩解內心的焦慮與不安，其中就包含透過社群媒體與朋友分享談論以及上網搜尋其他民眾的意見，更甚者，也影響渠等對政策提出者的支持傾向，認為風險感知越高的受訪者越支持政府採取明顯立即的處理方式。台灣的相關研究中，吳宜蓁 (1996) 也指出，民眾解讀政府透過媒體所建構的政策決定認知所衍生出的風險危機意識，將影響其後續決定是否進一步了解政策內容的重要指標；王嵩音 (1995) 亦透過情境公眾的理論解讀身處風險影響下的社會大眾，其可能的傳播行為，此外認為風險危機感知也會影響社會大眾對於政府政策的立場與態度。

綜上文獻回顧後，本研究提出風險感知觸發後續的相關假設如下：

假設 5：風險感知程度正向預測議題傳播行為。

假設 6：風險感知程度正向預測政策支持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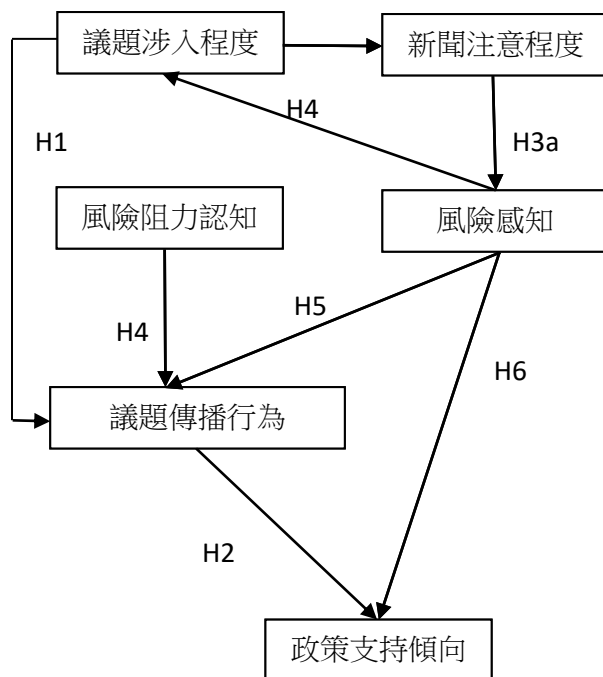
回顧以往媒體內容與重要公共政策研究，可發現當民眾在面對重大社會議題時，除主要藉由媒體的幫助，民眾得以從了解重大社會相關議題的風險衝擊程度外，社會大眾也經由媒體了解與解決或規避風險的難易度。易言之，傳播媒體對社會風險議題的傳播功能除了風險感知程度，對風險議題規避難易程度的「風險阻力認知」亦扮演重要的角色。

Mou 與 Lin (2014) 則進一步認為，風險阻力認知屬於風險感知 (Risk perception) 後衍生行為傾向的一部分，並且常與風險感知結合的概念探討風險傳播。例如，從健康信念模式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中發現，公眾對於風險訊息的感知指標，

包含受影響程度、嚴重性、利益性與有沒有解決或規避的可能性等面向的評估，將會影響公眾對於風險涉入程度的認知。Aldory 等（2010）的研究更探究風險阻力性認知產生後的可能影響，認為風險阻力性認知越高的大眾，越不想進一步了解風險議題的全貌。Flynn 與 Goldsmith（1993）針對金融與股票交易風險議題進行調查研究時，發現手中持有股票的民眾會比沒有股票的人更注意交易市場上的風險消息，即使這個風險訊息並沒有被證實；重要的是，當傳出交易危機的股票與自己密切相關，且在短期間內無法脫手時，越不想了解消息的真切性與細節。綜上風險感知後所產生問題阻力認知的相關風險傳播接續變項，本研究提出假設如下：

假設 7：風險阻力認知程度負向預測議題傳播行為。

本研究根據上述文獻整理提出之研究假設，形成下列研究架構圖一：



圖一 本研究架構圖

參、研究方法

一、抽樣與調查執行過程與樣本概述

本研究以調查法，委託華威行銷研究股份有限公司採取「電腦輔助電話號碼抽樣的系統訪問」（Computer 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 CATI）。調查時間為 2017 年 4 月 6 日（星期三）進行問卷前測。於 2017 年 6 月 8 日（星期四）起，至 2017 年 6 月 27 日止（星期二），合計 19 天執行正式訪問。正式施測期間為立法院會審

議公教人員年金相關法案審查期間，在立院的攻防引起相當的關注報導。抽樣方法為電話簿抽樣法，以「中華電信 105 年度住家版電話簿」為主要抽樣架構；依據各縣市所登載的電話數量設定樣本分配的參照比例，並以系統抽樣的方式每 10 個號碼抽出一戶對象，以台灣地區年滿 20 歲及以上中華民國國民為主，電話撥通後由訪員進行戶內抽樣，以電話問卷的方式進行約 10 分鐘的獨立樣本訪問。

本次訪問合計取得 1197 個有效樣本。以 95% 的信賴區間做估計，最大的抽樣誤差為 $\pm 3\%$ 。在調查執行期間，撥打 4,344 通電話，成功率約為 27.6%。為求樣本對母群體的代表性，本研究依據內政部公布「104 年人口靜態統計」數據中，的居住地區、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特性進行反覆加權。反覆加權過後的結果顯示，抽樣所取得的者分布特性與母群體之間並無顯著差異。詳細樣本分布請見表一：受訪者人口分布特性。

表一：受訪者人口分布特性

性別	男性 <i>n</i> =601	女性 <i>n</i> =596				
年齡	20-29 歲 <i>n</i> =201	30-39 歲 <i>n</i> =364	40-49 歲 <i>n</i> =297	50-59 歲 <i>n</i> =241	60 歲以上 <i>n</i> =94	
教育程度	小學及以下 <i>n</i> =95	國、初中 <i>n</i> =198	高中職 <i>n</i> =504	大學與大專 <i>n</i> =402	研究所以上 <i>n</i> =95	拒答 <i>n</i> =6
居住地	北部 <i>n</i> =476	中部 <i>n</i> =298	南部 <i>n</i> =305	東部 <i>n</i> =118		

二、測量變項

參本研究電話訪問中，測量的變項包含媒體新聞注意程度；議題傳播行為；議題風險感知；議題涉入程度；風險阻力認知；政策支持傾向；人口統計變項等，變項測量表尺設計如下：

（一）新聞注意程度

於新聞注意程度方面，則以「最近您有關注在網路上有關於年金改革相關議題的新聞報導嗎？」；「最近您有關注在電視上有關於年金改革相關議題的新聞報導嗎？」；「最近您有關注在報紙上有關於年金改革相關議題的新聞報導嗎？」；「最近您有關注在廣播上有關於年金改革相關議題的新聞報導嗎？」等四題項，來檢測者對不同新聞來源年金議題的注意程度。

各題項間以 Likert 六點量表，分別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點不同意」、「有點同意」、「同意」、「非常同意」。

（二）議題傳播行為

Kim 與 Grunig (2007) 認為議題傳播行為可認定為公眾對於特定議題資訊的搜尋、篩選與傳佈等面向。本題組的題項則是以六點 Likert 量表回答，其答案選擇計有，「1= 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 有點不同意」、「4= 有點同意」、「5= 同意」、「6= 非常同意」。

議題傳播行為傾向由以下三題項進行測量，「我會蒐集有關年金改革相關議題的資訊？」；「對於年金改革的資訊我會挑選閱讀並加以評估？」；「我會跟他人討論年金改革的相關議題？」傳播行為傾向的方式，將 3 題項的成果加乘後平均，所得分數越高，表示主動傳播行為傾向的程度越高 ($M= 3.15, SD= 0.92$)，以 Pearson 相關積差進行信度分析 ($r = 0.638, p < 0.01$)，結果呈現顯著相關。本研究將傳播行為的成果加乘後平均，所得分數越高，表示年金改革的議題傳播行為的可能性越高。

（三）議題風險感知

本研究依據前述的文獻規劃與整理，將民眾用以感知風險的類別，包含風險的嚴重性與毀滅性 (Slovic, 2000)、風險的臨近性 (Leppin & Aro, 2009) 等要素，設計納入民眾風險感知的題項。結合本研究的主軸後，調查台灣民眾對於年改相關議題風險認。其題項是以六點 Likert 量表回答，其答案選擇計有，「1= 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 有點不同意」、「4= 有點同意」、「5= 同意」、「6= 非常同意」，分數越高，其風險問題認知越高。

此構面的問項為「台灣年金系統可能破產的問題很嚴重。」；「社會上大多數的人都認為台灣年金系統可能破產的問題很嚴重。」；「您相信台灣年金系統有破產的可能。」等三個選項。風險認知程度的測量方式，將 3 題項的成果加乘後平均，所得分數越高，表示年改的風險感知程度的程度越高 ($M= 3.98, SD= 0.52$)，以 Pearson 相關積差進行信度分析 ($r = 0.792, p < 0.01$)，結果呈現顯著相關。

（四）議題涉入程度

議題的情境涉入認知指涉，公眾自我評估本身與特定議題的關聯性程度 (Grunig & Hunt, 1984)。吳宜蓁 (1996) 則是主張，議題的情境涉入應該區分為內部與外部的涉入感。其中，內部的涉入感指議題對於公眾自身的關聯性；而外部的涉入感則是指議題對於公所身處的環境或是社會脈絡所產生的影響或是關聯程度。本題組依此概念，以六點 Likert 量表設計題項，其答案選擇計有，「1= 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 有點不同意」、「4= 有點同意」、「5= 同意」、「6= 非常同意」，分數越高，其情境涉入認知越高。

此構面問項為「年金破產這件事跟您很有關係。」；「您很關心年金破產的相關議題。」；「跟週遭親朋好友相比，您更關心年金破產與改革相關議題。」；「未來幾年內，年金破產將會對台灣造成很大的影響。」情境涉入認知程度的測量方式，將 4 題項的成果加乘後平均，所得分數越高，表示年改的情境涉入認知的程度越高（ $M=3.01$ ， $SD=0.87$ ），以 Pearson 相關積差進行信度分析（ $r=0.621$ ， $p<0.01$ ），結果呈現顯著相關。

（五）風險阻力認知

風險阻力認知指涉公眾意識到問題存在後，認為採取行動的阻礙程度。Kim 與 Grunig（2007）認為，當公眾對於解決問題的困難度感知較高的時候，對於後續政策支持的態度或是傳播行為上的積極性可能隨之減弱。本題組的題項則是以六點 Likert 量表回答，「1= 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 有點不同意」、「4= 有點同意」、「5= 同意」、「6= 非常同意」，分數越高，其情境涉入認知越低。

「年金破產這件事是可以解決的。」；「為了挽救年金系統，您願意未來少領一點退休金。」；「為了挽救年金系統，您願意降低未來的生活品質。」；「即使您少領了退休金，年金系統還是會破產。」問題阻力認知程度的測量方式，將 4 題項的成果加乘後平均，所得分數越高，表示年改的問題阻力認知的程度越低（ $M=3.40$ ， $SD=0.49$ ），以 Pearson 相關積差進行信度分析（ $r=0.705$ ， $p<0.01$ ），結果呈現顯著相關。

（六）政策支持傾向

大眾對於年改政策的支持度為本研究的應變項，研究者透過以下四題項進行評估。題項計分方式為「1= 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 有點不同意」、「4= 有點同意」、「5= 同意」、「6= 非常同意」，分數越高，其政策支持傾向越高。

「政府應該延後退休年齡。」；「政府應該調降退休後的所得替代率（即退休後退休金減少）。」；「政府應該將年金基金轉投資以維持退休金水準。」；「政府應該從現職人員的薪水多提撥金錢到退休基金中。」政策支持傾向的測量方式，將 4 題項的成果加乘後平均，所得分數越高，表示年改的政策支持傾向的越高（ $M=3.00$ ， $SD=0.81$ ），以 Pearson 相關積差進行信度分析（ $r=0.695$ ， $p<0.01$ ），結果呈現顯著相關。

（七）人口統計變項

本研究人口統計變項與其他控制變項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居住地。年齡研究者歸類為「20-29 歲」、「30-39 歲」、「40-49 歲」、「50-59 歲」以及「60 歲以上」；教育程度則設定為「小學及以下」、「國初中」、「高中職」、「大學與大專」、「碩博士以上」。而居住地區歸類方式則以地區別來進行區分。

三、效度檢測

本研究量表之建構效度以因素分析檢測。研究量表各變項之KMO 值及Bartlett 球形檢定結果如下：「議題傳播行為」KMO 值 .71，Bartlett 球形檢定值581.33 ($p < .05$)；「議題風險感知」KMO 值 .78，Bartlett 球形檢定值621.02 ($p < .01$)；「議題涉入程度」KMO 值 .80，Bartlett 球形檢定值612.14 ($p < .001$)；「風險阻力認知」KMO 值 .72，Bartlett 球形檢定值517.40 ($p < .01$)；「政策支持傾向」KMO 值 .82，Bartlett 球形檢定值633.11 ($p < .001$)。各變數KMO 值均大於 .7，且Bartlett 球形檢定值均達顯著水準 ($p < .05$)，適合因素分析。

研究量表以主成份分析法及最大變異轉軸法因素分析，萃取特徵值大於1 之因素，傳播行為傾向量表累積解釋變異量79.54%；風險問題認知程度量表累積解釋變異量82.14%；情境涉入認知程度量表累積解釋變異量為77.26%；情境涉入認知程度量表累積解釋變異量為86.31%；政策支持傾向量表累積解釋變異量為85.22%，研究量表效度良好。

肆、資料分析與驗證

一、描述性統計

(一) 新聞注意程度

其中有關媒體新聞關注情形如下：

1. 網路：在網路新聞有關年改相關議題的新聞報導注意方面，非常不注意的有0.4%，不注意的有5.8%，有點不注意的有5.9%，有點注意的有35.9%，注意的有41.3%，非常注意的有10.7%。

2. 電視：在電視新聞有關年改相關議題的新聞報導注意方面，非常不注意的有0%，不注意的有3.5%，有點不注意的有1.8%，有點注意的有37.9%，注意的有47.5%，非常注意的有9.2%。

3. 報紙：在報紙新聞有關年改相關議題的新聞報導注意方面，非常不注意的有0.4%，不注意的有8%，有點不注意的有4%，有點注意的有37.8%，注意的有40.2%，非常注意的有9.6%。

4. 廣播：在廣播新聞有關年改相關議題的新聞報導注意方面，非常不注意的有3.3%，不注意的有27.6%，有點不注意的有12%，有點注意的有23.8%，注意的有29.2%，非常注意的有4.1%。

從本次1197 位受測者的媒體使用習慣結果中發現，有56.7%的受訪者對電視新聞年改議題表達注意與非常注意；其次為網路的52%；再者為報紙新聞的49.8%。

(二) 議題傳播行為

議題傳播行為方面，「我會蒐集有關年改相關議題的資訊？」非常不同意的有 4.3%、不同意的有 63.8%、有點不同意的有 8.2%、有點同意的有 8.6%、同意的有 12.2%、非常同意的有 2.9%；「對於年改的資訊我會挑選閱讀並加以評估？」的題項中，非常不同意的有 2.5%、不同意的有 44.9%、有點不同意的有 6.3%、有點同意的有 21.4%、同意的有 23.1%、非常同意的有 1.8%；「我會跟他人討論年改的相關議題？」此問項中，非常不同意的有 2.5%、不同意的有 42.7%、有點不同意的有 8%、有點同意的有 16.4%、同意的有 29%、非常同意的有 1.4%。

（三）議題風險感知

在風險認知方面，題項「台灣年金系統可能破產的問題很嚴重。」中，其中回答「非常不同意」3%、「不同意」15.9%、「有點不同意」7%、「有點同意」9.4%、「同意」53.9%、「非常同意」10.8%；而在「社會上大多數的人都認為台灣年金系統可能破產的問題很嚴重。」的題項，其中回答「非常不同意」1.3%、「不同意」20.1%、「有點不同意」6.7%、「有點同意」8%、「同意」55.9%、「非常同意」8%；最後是「您相信台灣年金系統有破產的可能。」，「非常不同意」3.3%、「不同意」20.7%、「有點不同意」6.7%、「有點同意」12.9%、「同意」44.9%、「非常同意」11.6%。上述前兩題是詢問者對於目前台灣年金系統的破產問題風險感知程度，發現有 72%到 74.1%的者表示擔心年金系統破產問題；然而，第三題詢問受測者相不相信年金系統破產的可能，亦有超過 65%的民眾表示擔心，顯見不論年金系統改革與否，台灣民眾都保持一定的風險感知程度。

（四）議題涉入程度

本研究在年改議題情境涉入方面，詢問者「年金破產這件事跟您很有關係。」中，其中回答「非常不同意」1.2%、「不同意」16.5%、「有點不同意」4.7%、「有點同意」10.5%、「同意」50.3%、「非常同意」16.8%；在「您很關心年金破產的相關議題。」此題項，其中回答「非常不同意」0.4%、「不同意」5.3%、「有點不同意」7.4%、「有點同意」25.8%、「同意」49.4%、「非常同意」11.7%；而「跟週遭親朋好友相比，您更關心年金破產與改革相關議題。」部分回答「非常不同意」1%、「不同意」23.7%、「有點不同意」15%、「有點同意」23.9%、「同意」30.6%、「非常同意」5.8%；最後是「未來幾年內，年金破產將會對台灣造成很大的影響。」，「非常不同意」2.3%、「不同意」18%、「有點不同意」5.8%、「有點同意」8.3%、「同意」53.3%、「非常同意」12.2%。發現超過 50%以上的民眾認為自己和年金議題是密切相關的，同時民眾對年改的政策立場是偏向贊成者居多。

（五）風險阻力認知

在風險問題認知方面，研究者詢問「年金破產這件事是可以解決的。」的問項中，回答「非常不同意」1.9%、「不同意」7%、「有點不同意」6.6%、「有點同意」13.5%、「同意」63.6%、「非常同意」7.5%；「為了挽救年金系統，您願意未來少領一點退休金。」此題項，「非常不同意」3.6%、「不同意」17%、「有點不同意」

8.3%、「有點同意」12.9%、「同意」52.4%、「非常同意」5.8%；「為了挽救年金系統，您願意降低未來的生活品質。」方面，「非常不同意」5%、「不同意」33.7%、「有點不同意」10.6%、「有點同意」15.1%、「同意」32.1%、「非常同意」3.4%；最後「即使您少領了退休金，年金系統還是會破產。」，「非常不同意」3.7%、「不同意」34.6%、「有點不同意」16.5%、「有點同意」13.4%、「同意」30.1%、「非常同意」1.7%。從此構面的題項一結果發現，超過 60%的民眾認為年金問題可以獲得解決，而題項二、題項三，則顯示出約 50%的民眾願意採取行動來協助解決年金問題。

（六）政策支持傾向

研究者詢問年改議題的政策支持度當中，第一題項「政府應該延後退休年齡。」中，其中回答「非常不同意」4.8%、「不同意」35.4%、「有點不同意」13.2%、「有點同意」12.1%、「同意」32.6%、「非常同意」2%；而「政府應該調降退休後的所得替代率（即退休後退休金減少）。」，其中回答「非常不同意」3.2%、「不同意」21.8%、「有點不同意」12.2%、「有點同意」12.4%、「同意」44.3%、「非常同意」6.1%；「政府應該將年金基金轉投資以維持退休金水準。」方面，「非常不同意」2.2%、「不同意」22.6%、「有點不同意」7.8%、「有點同意」14.6%、「同意」48.8%、「非常同意」4.2%；「政府應該從現職人員的薪水多提撥金錢到退休基金中。」結果則是「非常不同意」2.1%、「不同意」23.8%、「有點不同意」8.6%、「有點同意」14%、「同意」47.5%、「非常同意」4%。依據者的答題情形，可見民眾對於年改議題的政策支持具兩種不同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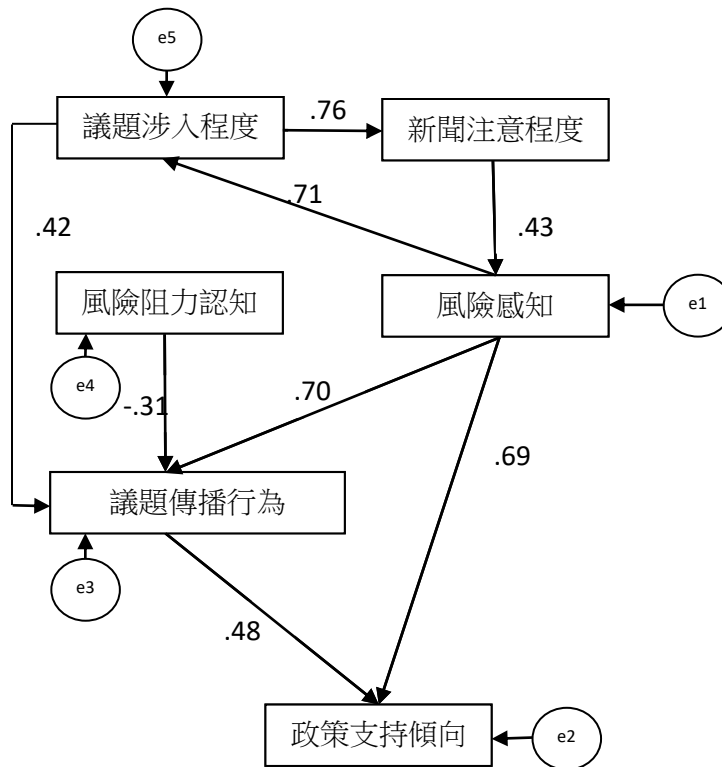
二、結構方程模式配適度分析與假設驗證

本研究以結構方程模式（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中測量模型之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測量觀察變項與潛在變數之間的關係。換言之，SEM 主要目的是在探討潛在變數（Latent variables）與觀察變數（Observed variables）之間的因果關係，進以驗證理論。在以往統計方式中使用的多變量分析方法，只能一次處理一組自變數及一組依變數之間的關係，以本研究所欲檢驗的一系列風險傳播與公眾情境的變項而言，可同時處理多個相互關連變項因果關係的方程模式是較佳的檢驗方式。另外，Schumacker 與 Lomax（2004）的研究指出，一般而言，穩定的結構方程模式，樣本數須在 100 份以上得進行模式的配適度驗證與檢定研究假說是否成立。

（一）結構方程模式配適度分析

本研究將以結構方程模式之潛在變項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 with latent variables; PA-LV）。PA-LV 是應用統合模型，及同時包括測量模型與結構模型之 SEM 模型技術來執行，屬於路徑分析和驗證性因素分析的綜合分析（Hoyle & Panter, 1995）。由於統合模型分析包括路徑分析與因素分析的概念，及探討潛在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由於無法直接測量，須由數個觀察變數進行間接測量，以驗證理論，

此法超越傳統路徑分析的功能（邱皓政，2005）。本研究進行正式檢驗前，先行以卡方值(χ^2)；自由度的比值(χ^2/df)；配適度指標(GFI)；調整後配適度指標(AGFI)；平均近似誤差均方根(RMSEA)；比較配適度指標(CFI)進行檢驗。檢驗結果顯示，配適度指標卡方 χ^2 之 p 值 $>.05$ ； $\chi^2/df=2.3$ ；GFI=.934；AGFI=.902；RMSEA=.15；CFI=.924。各項配適度指標均達理想或可接受標準。SEM 模型分析結果如圖二



圖二 SEM 模型分析結果

（二）路徑係數分析

結構方程式中的路徑係數，其數值越大表示在因果關係中的重要性越高，本研究假設究以路徑係數進行驗證直接效果，結果得知 H1、H2、H3a、H4、H5、H6、H7、均成立。綜言之，風險感知程度分別正向影響社會大眾的風險涉入程度（ $\beta=.71$ ）、傳播行為（ $\beta=.70$ ）與政策支持傾向（ $\beta=.69$ ）；而新聞注意程度則是扮演正向影響風險感知程度的角色（ $\beta=.43$ ）；同時，涉入程度正向影響議題傳播行為（ $\beta=.42$ ）而議題傳播行為又正向影響政策支持傾向（ $\beta=.48$ ）；最後本研究亦發現如公眾情境理論所述，風險阻力認知負向預測傳播行為（ $\beta=-.31$ ）。詳細成果見下表二。

表二：研究假設驗證表

假設	變數間關係驗證	標準化迴歸係數	C.R/ <i>p</i> 值	標準誤
H1	風險議題涉入程度→議題傳播行為	.42	9.84*	.06
H2	議題傳播行為→政策支持傾向	.48	10.20***	.05
H3a	新聞注意程度→風險感知程度	.43	11.62**	.05
H4	風險感知程度→議題涉入程度	.71	12.44**	.06
H5	風險感知程度→議題傳播行為	.70	13.13**	.04
H6	風險感知程度→政策支持傾向	.69	11.69***	.03
H7	風險阻力認知→預測議題傳播行為	-.31	9.26*	.05

*** $p < .001$; ** $p < .01$; * $p < .05$

（三）中介效果分析

本研究採取 Bootstrap 技術檢驗中介效果。Bootstrap 包含了 Bias- corrected percentile 與 Percentile 兩種估計方法，透過成對變項的估計值重複計算多次所得之平均估計值與標準誤以計算信賴區間；在 95% 的信心水準下，Lower 與 Upper 值若沒有包含 0，則中介效果達顯著水準（Hayes & Preacher, 2014）。此外，Preacher 與 Hayes（2008）指出，在 SEM 路徑分析的環境下，若變項間非屬單一中介，可以進一步運用 PRODCLIN 檢驗信賴區間，在信心水準 95% 時，間接效果的 Lower 與 Upper 值若沒有包含 0，亦可判斷 SEM 模型具備中介效果存在。

研究假設 3b 檢驗新聞注意程度為中介變項，自變項為風險議題涉入程度，應變項則為風險感知程度。研究者分別以 Bias- corrected percentile、Percentile、PRODCLIN 等估計法檢驗中介效果。結果顯示三種估計方法的 Lower 與 Upper 值均未包含 0。故假設 3b 成立，議題涉入程度越高的大眾，會因新聞注意程度跟隨上升後，覺得議題的風險程度也增高。詳細檢驗情形見下表三所示。

表三：議題涉入程度→新聞注意程度→風險感知程度中介效果檢驗

	Bootstrapping				PRODCLIN	
	Bias- corrected percentile		Percentile		95%CI	
	Lower	Upper	Lower	Upper	Lower	Upper
總效果	.53	.65	.54	.65	-	-
直接效果	.34	.40	.35	.60	-	-
間接效果	.25	.36	.29	.41	.31	.54

伍、結論與討論

本研究以公眾情境理論為主軸，探討當前我國面臨金改革此重要社會風險議題時，媒體新聞對不同情境涉入程度社會大眾的風險感知、風險阻力感知與議題傳播行為的影響，同時也將對政策的支持傾向納入檢驗目標，具體研究結論如次。

在媒體效果層面，本研究發現媒體新聞的注意程度正向影響社會大眾對於年改議題的風險感知。換言之，越注意大眾傳播媒體上年改相關新聞的民眾，覺得年改議題越重要。這樣的結果亦印證了 Lichtenberg 與 MacLean (1991) 的研究，認為新聞媒體對社會風險議題具有一定程度的擴大效果，媒體使用程度越高，越覺得風險社會程度越高。此外，本研究亦從社會情境理論的角度，檢驗議題涉入程度如何透由新聞注意程度以影響社會大眾的風險感知程度。結果也顯示社會大眾對自身所身處風險議題的位置，會影響到渠等對媒體新聞的注意程度。具體來說，當社會大眾覺得自己與年改議題越相關，那就會特別注意新聞媒體的相關報導，同時也預期風險議題的衝擊越大。

在風險感知與風險阻力感知方面，本研究亦發現風險感知程度會正向影響社會大眾對於金改革議題的傳播行為、政策涉入程度與政策支持傾向。回答年金改風險感知程度較高的受訪者，在傳播行為上，比較願意接收或與他人談論年改議題，也願意支持年改相關政策作為。值得一提的是，這樣型態的受訪者對年改的涉入程度也較高。本研究的檢驗範疇式除確認媒體對風險感知的影響力外，也將公眾情境理論的解釋層面延伸至社會風險議題的範圍。進而檢驗風險阻力認知與議題傳播行為構面時，受訪者呈現了認為年改議題越困難解決的受訪者，在議題傳播行為，包含搜尋資訊、談論年改等方面，呈現較低的傳播動機。

研究者整合公眾情境探討受訪者議題涉入程度的影響構面，透由本研究確認感知年年改議題越與自己切身相關的受訪者，對媒體相關的新聞關注程度較高，同時議題傳播行為的動機也較高。Major (1998) 對此態樣的解釋是，當風險來臨時，社會大眾為了消彌不確定與不安全的心理狀態，多是透過媒體了解風險議題的內容，此外也會提高與他人討論動機。本研究至此，將原有風險感知的理論範圍以風險感

知為自變項的內涵向前延伸，認為社會大眾的情境涉入感在社會風險議題中，亦是影響風險感知程度的重要參考依據。

就驗證公眾情境理論的內涵來說，本研究主題為彰顯結合社會風險議題感知，對社會大眾議題傳播行為、政策支持的影響。本研究確認新聞關注程度、風險感知程度、與議題涉入等變項間，呈現相互影響的關係。就研究者前述整理國內外相關的研究中，則未見相關的討論。此外，本研究檢驗結果符合 Grunig 與 Hunt (1984) 年建構公眾情境理論的精神，認為涉入感與阻力認知將會影響民眾對議題傳播行為的意願。而研究者則是進一步提出，議題傳播行為這個變項在年改議題中，顯著影響受訪者的政策支持傾向。雖然在 Aldoory, Kim 與 Tindall (2010) 針對社會大眾可能深思態樣與社會議題的風險感知研究時就提及，傳播媒體的效果是進行風險溝通的執行人員所無法忽視的，尤其在網際網路興起後，傳播媒體確實有可能影響社會大眾對政府政策的支持程度。然而，本研究則進一步具體提出民眾的傳播行為確實可能影響民眾對政府政策的態度。

就年金改革實質的政策溝通情境來說，本研究結果顯示社會大眾對年改結果衝擊嚴重程度的認知，廣泛影響渠等對年改推動進度的關心程度、與他人討論的意願，更甚者，影響其對於政府改革的支持程度。重要的是，研究者證實，新聞注意程度扮演著整體風險傳播的關鍵角色，社會大眾透過新聞關注、感知、評價政府改革方針，故在實務的政策溝通上，媒體溝通與論述策略的確認與調整，是未來溝通的首要考量。此外，Kim 與 Grunig (2007) 的研究即強調，身處不同情境與位置的公眾，對公共政策影響的認知差異是源自涉入程度。當代前政策溝通部門應將政策主要目標加以分類。根據本研究調查結果發現，我國社會大眾目前對年改議題的依賴新聞來源，有超過 56% 民眾是依賴電視新聞為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回答以網路為主要消息來源的受訪者有 52%，已經超越報紙的 49.8%。綜合以上論述，可發現電視及網路為主要年金相關議題傳播管道的台灣社會，民眾對改革的風險感知與問題限制感知，還是很大的部分受媒體的引導，並且，身處改革政策不同位置的民眾，媒體的影響程度也有些許差異。是故在年金改革政策溝通的論述策略上，本研究結果顯示當社會大眾認為年改的阻力越大，其傳播意圖也隨之下降，根據前述結果，也間接影響政策支持意願。故當局執行年金改革政策說服策略上，呈現具體可行且風險阻力認知較低的政策規劃，將有助於整體改革推動。

在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部分，首先要討論的是，雖然本研究檢驗了不同情境下，社會大眾不同新聞注意程度影響風險感知、風險阻力感知進而嘗試探討行為傾向的關聯性。但無法將媒體新聞的框架效果納入檢驗主軸。詳言之，如杜文苓、施麗雯與黃廷宜 (2007) 年針對我國產業園區設置的環境與社會風險感知時所提，台灣媒體政黨色彩鮮明，長期影響閱聽人後，許多閱聽人產生了對特定立場媒體的

偏好，進而在面對需要判斷的社會風險議題時，就到媒體報導框架的影響，而產生了先入為主的態度。後續的研究中可將媒體報導的框架效果納入檢驗的標的。

在實務建議上，本研究選擇在總統府年改委員會與立法院審議公教人員年金時，進行大規模的民意調查。主要的目標是檢驗不同情境下的公眾，如何藉由傳播媒體產生風險感知、風險阻力感知、傳播行為乃至於政策支持傾向。對風險溝通與政府公共事務執行人員而言，本研究確認區分不同情境公眾進行風險溝通的必要性。也將原有的風險理論框架向上延伸到民眾涉入感；向下拓展至行為傾向的解釋。妥適運用本研究成果以消弭社會對立，順遂風險政策溝通工作，方為本研究主要的核心訴求。

陸、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 〈直擊希臘病上身 台灣年金破產倒數〉（2015 年 7 月 1 日），《今周刊》。取自：
<http://money.udn.com/money/story/5648/1028634?ref=tab20150701>。
- 王嵩音（1995）。〈情境公眾之傳播行為與認知策略〉，《民意研究季刊》，193：27-43。
- 朱元鴻（1995）。〈風險知識與風險媒介的政治社會學分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9：195-224。
- 吳宜蓁（1996）。〈選舉議題之公眾及其政治資訊傳播型態：以「情境理論」為架構〉，《民意研究季刊》，195：41-59。
- 邱皓政（2005）。《量化研究與統計分析（二版）》。台北：五南圖書。
- 杜文苓、施麗雯、黃廷宜（2007）。〈風險溝通與民主參與：以竹科宜蘭基地之設置為例〉，《科技醫療與社會》，5：71-110。
- 林煒國（2010）。《聯合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蘋果日報有關全球暖化議題的內容分析》，佛光大學傳播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倖妃、林昭儀（2013 年 2 月 5 日）。〈年金改革 沒解決的 3 大問題〉，《天下雜誌》。取自：<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47208>。
- 林上祚（2015 年 10 月 11 日）。〈潛藏負債逾 18 兆！破產順序：軍保→勞保→公保→國民年金〉，《聯合報》，第 2 版。
- 易佳玲（2011）。《政府風險溝通、新聞發布與媒體報導之研究－以新流感為例》，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姜采蘋（2008）。《新聞報導和公關稿之主題框架及風險訊息差異：以腸病毒為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柏亨（2017 年 6 月 27 日）。〈公務員年金改革法案正式三讀〉，《聯合新聞網》。取自：<https://udn.com/news/story/6656/2549024>
- 陳炳宏、黃以敬（2015 年 7 月 14 日）。〈軍公教勞四大基金 面臨破產危機〉，《自由時報電子報》。取自：<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897728>。

- 陳凱莉(2012)。《從問題解決情境理論探討食品安全風險議題與公眾風險認知》，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所碩士論文。
- 陳怡仁（2007）。《軍職人員退撫基金之破產對策》，國防大學管理學院國防財務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
- 辜勁智（2011）。《風險報導與公眾認知研究：以情境理論檢視超級細菌 NDM-1 為例》，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 賀權修（1995）。〈情境理論與企業公關之研究-以高雄後勁地區為例〉，《廣告學研究》，5：203-241。
- 楊意菁、徐美苓（2012）。〈環境風險的認知與溝通：以全球暖化議題的情境公眾為例〉，《中華傳播學刊》，22：169-209。
- 黃懿慧（1994）。〈科技風險的認知與溝通問題〉，《民意研究季刊》，188：95-129。
- 張謙韋（2007）。《SARS 新聞報導內容分析之研究—以自由時報與中國時報為例》，玄奘大學資訊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榮泰生（1999）。《消費者行為》。台北：五南圖書。
- 鄭國強（2015 年 7 月 1 日）。〈6 成民眾憂破產 盼推年金改革〉，《台灣醒報》。取自：<https://anntw.com/articles/20150701-atHH>。
- 洪紹祺（2014）。《由福利經濟及正義理論之視野對我國年金改革之評價研究》，國防大學財務管理學系碩士論文。
- 葉崇揚（2017 年 4 月 22 日）。〈年金改革面面觀〉中研院葉崇揚博士：笨蛋！問題在制度！取自 <http://news.cnyes.com/news/id/3787680>
- 〈中華民國 105 年政府審計年報〉（2017 年 4 月 18 日），《審計部全球資訊網》。取自：<https://www.audit.gov.tw/files/11-1000-105.php>
- 〈公務人員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草案〉（2017 年 1 月 20 日），《銓敘部全球資訊網》。取自：
<http://www.mocs.gov.tw/FileUpload/1194-5219/Documents/%E5%85%AC%E5%8B%99%E4%BA%BA%E5%93%A1%E9%80%80%E4%BC%91%E5%88%B6%E5%BA%A6%E6%94%B9%E9%9D%A9%E6%96%B9%E6%A1%88%E8%8D%89%E6%A1%88.pdf>

郭明政（1997）。《附加年金或公積金？勞基法勞工退休制度改革之十字路》，勞工教育推廣協會主辦之勞工退休制度研討會論文。

郭明政主編（1999）。〈年金制度之諧調與整合〉，《年金制度及其法律規範》，261-290。

鄭琪玉（2005）。《環境變動與組織人力政策對公務人員退撫基金現金流量與破產時間之影響》，國防大學管理學院國防財務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

候仁義（2001）。《德國年金制度之研究-及其對臺灣年金制度形成之啟示》，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蘇佳玲（2009）。《芬蘭年金制度改革及對我國中高齡勞動參與啟示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高齡者教育所碩士論文。

二、西文部分

Aldoory, L., & Van Dyke, M. (2006). The role of perceived “shared” involvement and information overload in understanding how audiences make meaning of news about bioterrorism.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83, 346-361.

Aldoory, L., Kim, J. N., & Tindall, N. (2010). The influence of perceived shared risk in crisis communication: Elaborating the situational theory of publics.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36, 134-140.

Asim, Z., & Todd, A. M. (2010). Evaluating the effects of ideology on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climate change science: How to improve communication across ideological divides?.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19(6), 743-761.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M. Ritter, Trans.). London: Sage.

Boyce, T. (2007). *Health, risk and news: The MMR vaccine and the media*. New York, NY: Peter Lang.

Breakwell, G. M. (2000). Risk communication: Factors affecting impact. *British Medical Bulletin*, 56(1), 110-120.

Brun, W. (1992). Cognitive components in risk perception: Natural versus manmade risk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5, 117-132.

Chaffee, S. H., Zhao, X., & Leshner, G. (1994).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the campaign media of 1992.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1(3), 305-324.

- Flynn, L. R., & Goldsmith, R. E. (1993). Application of the 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 in marketing. *Psychology and Marketing*, 10, 357-366.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 Giesbrecht, N. (2007). Community-Based Prevention of Alcohol Problems: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Increasing Deregulation of Alcohol. *Substance Use & Misuse*, 42(12/13), 1813-1834.
- Griffin, R., & Dunwoody, S. (2000). The relations of communication to risk judgment and preventive behavior related to lead in tap water. *Health Communication*, 12, 81-107.
- Grunig, J. E., & Hunt, T. (1984). *Managing public relations*. New York: CBS college Publishing.
- Hamilton, P. K. (1992). Grunig's situational theory: A replication, application, and extension.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4, 123-149.
- Hayes, A. F., & Preacher, K. J. (2014). Statistical mediation analysis with a multicategorical independent variable. *British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and Statistical Psychology*, 67, 451-470.
- Hoyle, R. H. (1995).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 Concepts, issues, and applications*. Sage.
- Holland, K., Blood, R. W., Imison, M., Chapman, S., & Fogarty, A. (2012). Risk, expert uncertainty, and Australian news media: public and private faces of expert opinion during the 2009 swine flu pandemic.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15(6), 657-671.
- Kim, J. N., & Grunig, J. E. (2007). Explicating and validating communicant activeness in problem solving (CAP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Public Relations Division*, San Francisco, CA.
- Kim, J. N, Lan, N., & Lee, Eun-Ju. (2008). Classifying publics: Communication behaviors and problem-solving characteristics in controversial issues. *Conference Papers. 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1-42.
- Kim, J.-N., Grunig, J. E., & Ni, L. (2010). Reconceptualizing the communicative action of publics: acquisition, sele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in problematic situ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ategic Communication*, 4(2), 126-154.

- Leppin, A. & Aro, A. R. (2009). Risk perceptions relationed to sars and avian influenza: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current empiric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Behavioral Medicine*, 16, 7-29.
- Lichtenberg, J. & MacLean, D. (1991). The role of the media in risk communication. In R. E. Kasperson & P. J. M. Stallen (Eds.), *Communication risks to the public*.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Lin, C. A. (2009). Selective News Exposure, Personal Values, and Support for the Iraq War.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57(1), 18-34.
- Major, A. M. (1998). The utility of situational theory of publics for assessing public response to a disaster prediction,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4(4), 489-508.
- McCarthy, M., Brennan, M., De Boer, M., & Ritson, C. (2008). Media risk communication - what was said by whom and how was it interpreted. *Journal Of Risk Research*, 11(3), 375-394.
- McComas, K. (2003). Citizen Satisfaction with Public Meetings used for Risk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1(2): 164-184.
- Monberg, J. (1998). Making the public count: 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emerg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based publics. *Communication theory*, 8, 426-454.
- Mortensen, P. B. (2010). Political Attention and Public Policy: A Study of How Agenda Setting Matters.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33(4), 356-380.
doi:10.1111/j.1467-9477.2010.00254.x
- Mou, Y., & Lin, C. A. (2014). Communicating Food Safety via the Social Media: The Role of Knowledge and Emotions on Risk Perception and Prevention. *Science Communication*, 36(5), 593-616. doi:10.1177/1075547014549480
- Ogata J., K., Denham, B. E., & Springston, J. K. (2006). Effects of Mass and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n Breast Cancer Screening: Advancing Agenda-Setting Theory in Health Contexts.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4(1), 94-113. doi:10.1080/00909880500420242
- O'Cass, A. (2002). Political advertising believability and information source value during elections. *Journal of Advertising*, 31(1), 63-74.
- Preacher, K. J., & Hayes, A. F. (2008). 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40, 879-891.

- Procopio, C. H., & Procopio, S. T. (2007). Do you know what it means to miss New Orleans? Internet communication, geographic community, and social capital in crisis.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5, 67-87.
- Sheafer, T. & Weimann, G. (2005). Agenda building, agenda setting, priming, individual voting intentions, and the aggregate results: An analysis of four Israeli election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5(2), 347-65.
- Slovic, P., ed. (2000). *The Perception of Risk*. London: Earthscan.
- Schumacker, R. E., & Lomax, R. G. (2004). *A beginner's guide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sychology Press.
- Zhao, X., Chaffee, S. H., & Bleske, G. L. (1993). Audience Learning from Television News and Ads During a Political Campaign. *In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